

OXFORD

過

The

去

Voice *of*

the **Past**

的

O *r* **a** *l*

H *i* **s** *t* **o** *r* **y**

口
聲
歷
史
述

聲

音

Paul Thompson

保羅·湯普遜

過去的聲音

口述歷史

保羅·湯普遜
(Paul Thompson) 著

覃方明 渠東 張旅平合譯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Paris São Paulo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Warsaw

with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New edi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Paul Thompson 1978, 1988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irst published 1999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過去的聲音
口述歷史

湯普遜 (Paul Thompson) 著

覃方明 渠東 張旅平合譯

ISBN 0-19-592109-7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台灣總經銷：正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樓
傳真：2363 9735 電話：2367 3012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初版序言

本書既與歷史學的方法，也與歷史學的意義有關。首先，這是對於歷史學家如何使用口頭資料來源的介紹。但是恰恰是對這些來源的使用提出了根本性的問題，而我決定將這些問題置於本書的開頭，然後一步一步地邁向後面更為實際的章節。與此同時，我在寫作時想到許多不同類型的讀者，把他們視為我的讀者對象。有些讀者可能更加直接關注如何設計一個課題，以及如何收集與評價訪談材料。他們將在第六章（課題）、第七章（訪談）和第八章（儲存和篩選）中找到實際的忠告。確實，從田野工作開始會有一種良好的感覺。口述史的實踐經驗本身，就誘使人們去追問有關歷史學本質的更深入的問題。

首先，這些問題涉及證據的特徵。口頭證據的可靠程度如何？它與現代歷史學家更熟悉的文獻來源相比情況如何？這些批判性的、直接的問題在第四章（證據）中將會遇到。但是它們只有被置於歷史寫作發展的更廣闊脈絡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第三章（口述史的成就）評價了新近的文獻著作和口頭證據在提供探索的新視角與打開探索的新鮮領域方面所作出的貢獻。第二章（歷史學家與口述史）追溯歷史學本身的過去，探索歷史學家掌握證據的不斷變化的途徑，從口頭傳說的原始顯赫地位到文字文獻和磁帶錄音機的新紀元。

但是這不可避免地導致第二組涉及歷史的社會功能的問題。確實，在寫作第二章時下述觀點才變得清晰起來：學術技術的演化只有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才能夠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並且在選擇和評價口頭證據方面的問題也已經指向了同樣的方向。我們如何選擇要去傾聽的人？歷史學僅僅因為它對今天的人們有意義才作為社會活動幸存下來。昔日的聲音對今日至關重要。但是所聽到的是誰的聲音？

因此，雖然方法和意義可以作為獨立的主題來處理，但他們在根本上是不可分離的。對證據的選擇必然反映着歷史在共同體中的作用。這部分

說來是個政治問題，歷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只能獨立地達到他們自己的立場。因此，雖然甚至在這裏，大部分論證也是直接關乎人性的而非政治的，但是第一章（歷史學與共同體）是從社會主義的眼光寫作的。並且我自己相信，口述史的最豐富的可能性就在於一種更有社會意識的、更民主的歷史學的發展之中。當然，同樣可以從保守的立場出發，作出一個使用口述史的講述案例來保存（原文為 *perserving*，殊不可解，疑為 *preserving* 之誤）傳統的全部豐富性和價值。口述史的優點並不是它必然需要這樣或那樣的政治立場，而是使得歷史學家意識到他們的活動不可避免地是在一個社會脈絡之中並伴隨着政治含義而被從事的。

因此，本書是一本有關歷史學家能夠如何收集與使用口頭證據的實踐性的書籍。但是它同樣力圖激發歷史學家去問他們自己，他們正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他們這樣去做。他們對過去的重建基於誰的權威之上？這一重建試圖為誰說話？簡而言之，過去的聲音是誰的聲音？

我很幸運，在寫作本書時能夠依靠許多朋友和同事的幫助，特別是在口述史學會（the Oral History Society）和在埃塞克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ssex）的朋友和同事。在此我只能單獨向很少幾個人表示感謝，但我實際應當感謝他們所有的人。在十年的研究活動和學生課題中，以及在討論與會議的廣泛領域內，實驗、錯誤與成功已經築成了廣泛共享的集體經驗。本書正是基於這一經驗之上。首先，本書依靠在研究中，後來在研究生教學中的合作工作，維格內（Thea Vigne）和我通過這些工作偶然發現了，並且我們自己探索了將口頭證據用於社會史研究的可能性。她對我的幫助是無法估量的。我還應當再次感謝那些在這一社會史研究的第一個成果，《愛德華時代的人們》的序言中提到過的其他人們，特別是埃文斯（George Ewart Evans）和瑪格林（Mary Girling）。而對現在的這一書稿，為了對它的特別貢獻和對它早期草稿的意見，我要特別感謝 Keith Thomas, Geoffrey Hawthorn, Bill Williams, Colin Bundy, Trevor Lummis, Roy Hay, Michael Winstanley, Gina Harkell, Joanna Bornat, Alun Howkins, Eve Hostettler, Natasha Buecharadt, Raphael Samuel。

再版序言

自從我寫作本書以來，十年間已經發生了許多事情。那以後開始進行的工作已經導致了某些傑出歷史著作的出版。我們已經在我們對於記憶過程的複雜性和對於口頭資料來源的解釋的理解上向前邁進了。我們已經目睹了地方共同體課題的蓬勃發展，和在成年人的文學的、戲劇的和回憶懷舊的療法上新的運動的興起。我們已經對於口述史的過去了解得更多。我們已經發展出了與對生活經歷的社會學研究的更堅實聯繫，並且我們已經聯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口述史學家的國際共同體。

所有這些發展都反映在這一新版本中。我特別擴展了論述「歷史學和共同體」、「歷史學家和口述史」，以及「口述史的成就」這前三章；我已經在論述「證據」的重寫的一章（第四章）中引進了對於「主體性」、精神分析和作為療法的記憶的新的討論，並且引進了新的一章討論「記憶與自我」（第五章）；我還重寫並擴展了論述「闡釋」的最後一章（第九章）。

我希望我能夠感謝所有那些在過去的年代裏以思考和經驗幫助過我的人，他們的思考和經驗反映在這一修訂本中；但是他們的人數太多了，無法在這裏一一列舉。除了我要繼續深深感謝那些英國的朋友和同事之外，我現在還要感謝許多來自其他國家的朋友，特別是我在斯堪的納維亞、波蘭、法國和意大利、比利時和西班牙、北美和中國等地旅行中所遇到的許多慷慨的主人。讓我只向格雷爾（Ron Grele）致敬，他在創造口述史的國際論壇上發揮了關鍵作用；我還要表示我對 Daniel Bertaux, Isabelle Bertaux-Wiame, Luisa Passerini 以及我們在都靈（Turin）的其他朋友們的特殊感激之情，我們與他們一起在這些年裏為共同的研究課題而工作。

目 錄

初版序言	vii
再版序言	ix
1. 歷史與共同體	1
2. 歷史學家與口述歷史	19
3. 口述歷史的成就	67
4. 證據	95
5. 記憶與自我	139
6. 課題	155
7. 訪談	183
8. 儲存與篩選	201
9. 闡釋：歷史的構成	217
深入閱讀與註解	249
典型問題	270
譯名對照表	282

1 歷史與共同體

任何歷史都取決於其歷史目的。這就是以往歷史始終為口頭傳說和文字記述所相傳的原因，也是今天專業史學家從公共基金中獲得資助，孩子們在學校裏學習歷史，業餘史學會興旺發達，通俗史著作被列為暢銷書之一的原因。有時候，歷史的社會目的是模糊不清的。有好些學究喜歡對偏僻的問題進行實地研究，避免與寬泛的解釋或當前各種問題發生任何糾葛，只堅持為知識而尋求知識。他們與單調乏味的當代旅遊有個共同之處，彷彿只有把過去當成是人們所逃遁的異鄉才能利用過去；建築遺產和風景受到了如此親切的關照，以致於這種愜意已經有些不盡人情了，社會的苦難、殘酷和衝突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奴隸制的殖民活動竟然變成了積極的、歡快的事情。一方面，他們不但要留心自己的收入免受干預，而且反過來他們也不會對社會制度構成任何挑戰。就另一種極端情況而言，歷史的社會目的也是相當喧囂的：過去往往為戰爭與征服、掠奪領土、革命與反革命以及某個階級或種族對另一個階級或種族的統治而辯護。在不易得到歷史的地方，歷史卻會被創造出來。南非的白人統治者會按照部落和「祖國」來區分城市中的黑人；威爾士民族主義者會在行吟詩人大會中聚集起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人被迫去創造基層群眾鬥爭的新「四史」；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會在尋找沒有母性的母親的過程中特別留意奶媽的歷史。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有許多其他目的，有的比較明顯，有的則不太明顯。對政治家來說，過去是確立各種具有證實作用的符號的來源：譬如帝國的勝利、烈士、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反饑餓遊

行示威，等等。此外，公眾呈現出來的歷史也有許多空隙，它們幾乎可以同樣說明問題：比如俄國對托洛茨基的沉默、西德對納粹時代的沉默，以及法國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沉默，等等。

藉助歷史，普通人想要理解的是他們親身經歷的動蕩和變遷：比如戰爭、能夠使年輕人的地位發生改變的社會轉型、能夠使蒸汽動力壽終正寢的技術變革、或者是個人向新的社區遷移等等。尤其是家族史，可以使個人產生某種強烈的感覺：他們覺得個人的壽命會延續得更長些，甚至在他們死後仍舊可以存活下來。通過地方史，村莊和城鎮可以探索其自身變遷性質的意義，而新來的人則可以在其個人歷史知識中增加些根源感。通過在學校教授政治史和社會史，可以幫助孩子們理解和領會他們生活其中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是如何發生的，暴力和衝突是怎樣曾經和繼續在該體制的演變過程中發揮作用的。

口述史所形成的挑戰，部份是由於它與歷史的這種基本目的有所關聯。這就是它為什麼使有的歷史學家如此興奮，有的歷史學家如此恐懼的主要緣由。實際上，這樣害怕口述史是毫無根據的。稍後我們便會看到，專業史學家早就利用訪談作為史料來源了，它與學院派的標準是完全一致的。美國的經驗足以清楚表明，口述史方法會在社會和政治上持有保守態度的情況下被經常加以利用，或者在實際生活中被大力推行，甚至發展到托蘭德（John Toland）在《希特勒》（*Adolf Hitler*, New York 1976）中所刻劃的對希特勒的同情。

口述史未必就是變遷的工具；它取決於利用它的時候所貫徹的精神。不過，口述史當然也可以成為改變歷史內容和目的的手段。它可以用來改變歷史本身的重點，開闢新的探究領域；它還能夠破除師生之間、代際之間、教育結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障礙；此外，在歷史寫作過程中，無論藉助書籍、博物館還是廣播電影，它都能通過曾經創造過和經歷過歷史的人們自己的語言，重新賦予他們在歷史中的中心地位。

直至本世紀，歷史的焦點基本上還是政治問題：即有關權力鬥爭的文獻編纂，其中，除了諸如宗教改革、英國內戰或法國大革命這樣的危機時代以外，普通人的生活或者是經濟和宗教所起的作用很少受到關注。歷史

時期是按照王權和朝代來劃分的。甚至地方史所關注的主題也只是郡的分區和教區管理，而不是社區和街區的日常生活。之所以如此，部份是因為當時的歷史學家本身就屬於管理階層和統治階級，他們認為只有上述那些事情才是最最緊要的。除非在特定的情況下，勞動者顯得比較棘手，否則他們是不會對勞動者的看法產生任何興趣的；作為男人，他們也不想考察婦女生活所經歷的各種變化。然而，即使他們想寫不同種類的歷史，也並非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因為他們借以寫作歷史的原始材料，即文獻，也是由具有同樣特權的人存毀的。文獻愈是私人的、地方的和非官方的，就愈是難以倖存。整個權力結果就像一台巨大的錄音機，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塑造過去。

甚至在地方記錄機構建立以後，情況也依然如此。出生登記和結婚登記、會議記錄以及有關貧民救濟和福利管理的記載、全國性的報紙和地方報紙、學校教師的教學日誌——各種各樣的合法記錄被大量保存起來，此外，往往還有好些教會檔案和帳目、私營大公司和地主莊園的其他帳本、甚至像土地所有者這樣的統治階級所藏的私人信件，等等。不過，對男工和女工無數的明信片、信件、日記以及隻言片語來說，或者對像街角商店或山地農場這樣的小行業所留下的書面材料來說，在哪兒都很難保存下來。

結果，甚至在歷史的範圍業已拓寬的時候，原有的對政治和行政的關注仍然保留了下來。凡是引入普通人的地方，這些人基本上被當成了從較早的行政調查中產生出來的統計總體（statistical aggregates）。因此，經濟史是圍繞着三種類型的資料來源而構建的：工資、價格和失業的總體比率；國家和國際對經濟的政治干預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信息；對特定的商業和工業的研究，它所依據的是對個別企業，即那些規模比較大、業績比較好的公司的記錄。同樣，長期以來，勞工史也是由此類研究構成的：一方面，是工人階級和國家之間普通意義上的關係；另一方面，是有關工會和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的比較特殊，卻很關鍵的記載；正是這些比較大、比較成功的組織，才往往不可避免地會留下各種記錄，或授權編寫自己的歷史。社會史則仍然特別關心像福利國家興起那樣的立法和行政方面的發展，或者像人口數量、出生率、婚齡、戶和家庭結構那樣的總體數據。在

近期的歷史專項研究中，人口統計學幾乎始終關注着統計總體問題；儘管家庭史顯得雄心勃勃，在闖入與情緒和情感有關的歷史的過程中常常判斷失誤，但它所追隨的還是以習俗為出發點的社會史路線；至少最近這段時期，婦女史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把精力放在了為獲得公民平等，首先是為獲得選舉權而開展的政治鬥爭之中。

當然，在所有這些領域內，都有很重要的例外現象發生，這表明甚至對現存的原始資料來說也可能有不同的處理方法。而且，即使在官方記錄，如宮廷文件中也有相當多的未被利用的個人信息和普通信息，它們完全可以採用新的方式加以利用。歷史寫作前後相繼的模式，大體上可以反映出這個專業裏的絕大多數人在官僚制、國家權力、科學和統計學的時代裏擁有優先地位，儘管他們已經不再是統治階級本身。然而實際情況依然如此，依據文獻材料去寫作任何其他類型的歷史仍然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湯普遜（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和欣頓（James Hinton）的《最早的店員運動》（*The First Shop Steward's Movement*, 1973）就說明了這種情況，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據的仍然是受僱的政府通訊員在19世紀初和一次大戰時期所寫的報告。當社會主義歷史學家不得不利用政府密探的記錄來書寫歷史時，他們所受到的壓抑顯然達到了極點。哎，我們確實不能去訪談墓碑，但至少在一次大戰時期或追溯到19世紀末期，口述史的應用卻直接為富有創造性的歷史學家提供了豐富多采的資源。

就最一般的意義而言，一旦各種各樣的人的生活經驗能夠作為原材料來利用，那麼歷史就會被賦予嶄新的維度。就其性質來說，口述史多提供的材料非常接近於公開出版的自傳，不過其範圍卻更寬泛些。公開出版的自傳絕大多數都來自於像政治領袖、社會領袖和精神領袖這樣的有限群體，甚至當歷史學家足夠幸運，能夠從特定的時間、地點以及他碰巧需要的社會群體中發現自傳時，這些自傳也很少或沒有對要害問題予以關注。相比而言，口述史學家卻可以準確地選擇訪談的對象和提出的問題。此外，訪談還會提供某種發現某些書面文獻和照片的手段，倘若沒有這些手段，這些材料就不會被追查到。學術界的範圍已經不再是翻來覆去、卷帙

浩繁的舊目錄。現在，口述史學家彷彿覺得他們自己就是出版人：設想需要什麼證據，就去搜尋和捕獲它。

這種新方法對大量現存歷史的批判所帶來的效果，也許就是從新的方向上獲得證據。工人階級政治史學家能夠把政府或工會頭頭們的說法與老百姓的呼聲並置起來——顯得既很冷漠，又很好鬥。這無疑會對更加現實地重建過去提供某些幫助。現實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口述史的首要價值就在於，相比於絕大多數的原始材料，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再造原有的各種立場。不過，這種優勢不僅僅對歷史寫作而言是重要的。絕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曾做過或隱或顯的判斷——平心而論，歷史的社會目的需要在過去與現在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中去理解過去。就社會使命而言，現代的職業史學家遠沒有麥考利（Macaulay）和馬克思那樣開放，因為學術標準似乎與公開的偏見發生了衝突。然而，不管社會使命如何難以捉摸，它通常都是現時的（present）。歷史學家把大量精力和引述都集中在了他們所仰慕的那些社會領袖身上，這當然是容易不過的事情，然而他們自己卻從未提出過任何肺腑之見。由於現有的大多數記載在性質上所反映的是權威的觀點，因此，歷史判斷經常為當局的意見辯護是不足為奇的。相反，口述史卻可能進行更公平的嘗試：證據還可以從下等人、無特權者和失敗者的口中說出來。口述史可以更現實、更公平地重構過去，可以向既定的記述提出挑戰。只要這樣做，口述史就可以使整個歷史的社會使命具有某些激進的意涵。

與此同時，對許多種類的歷史而言，口述史意味着歷史重心的轉移。只有這樣，教育史學家才會像關注教師和行政人員的問題那樣，關注孩子們和學生們的各種經歷。研究陸軍和海軍的史學家才會跳出將軍一級的戰略和裝備問題，而考慮戴有其他軍銜的軍官和士兵的生活條件、娛樂和士氣等問題。社會史學家才會把目光從官僚和政客的身上轉向貧民，了解窮人怎樣看待救濟官，他們遭到拒絕以後如何存活下來的問題。政治史學家才會去接近在家裏或班上的選舉人；甚至願意去理解那些比較保守的工人階級——對調研工作而言，這些人既提供不了報紙，也沒有什麼組織。經濟學家才會把僱主和工人共同當作社會人來觀察，並在他們很普通的工作

中，更加切近地理解典型的經濟過程，以及它的成功和矛盾。

在某些領域裏，口述史不僅能夠導致歷史重心的轉移，而且還會開闢出很重要的、新的探索領域。例如，勞工史學家可以最先對絕大多數未曾組織工會的男女工人，及其平常的工作經驗以及對家庭和社區的影響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這些歷史學家已經不再囿於那些已經成立工會組織的行業，或者是因罷工或赤貧而贏得當前公眾的注意和考察的行業。同樣，城市史學家也能夠從像貧民窟這樣已經被深入研究過了的問題域轉向對城市典型生活方式的關注：例如小工業城鎮或集鎮、或者是中產階級居住的市郊（它們已經構成了社會差別的區域性模式）、鄰里間和親屬間的互助、以及閑暇和工作。他們甚至可以從內部來探討移民群體的歷史，這種歷史顯然在英國已經顯得越來越重要，它往往被當成某種社會問題，並從外部出發依據文獻進行證明。正是社會史學家才分享了這些機遇——以及其他許多機遇：如對工人階級閑暇和文化的研究；或者從常人角度出發對罪犯的研究，這些罪犯常常是些尚未被發現的、能夠得到社會些許容忍的偷獵者、扒手和小偷。

不過，口述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徵，或許就是它對家庭史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倘若沒有口述史的證據，歷史學家就不可能恰如其份地發現普通家庭與鄰居和親屬之間的聯繫，或是其內在的關係。夫妻角色、撫養子女、情感和物質上的衝突和依賴關係、年輕人贏得自立的鬥爭、求愛、婚內外的性行為、避孕和流產——所有這些，都是十分隱秘的領域。要想搜集這些材料，只有唯一的線索，就是從總體統計以及少量觀察者（通常只是部份地）那裏去搜集。於是，便產生了歷史的貧瘠，安德森（Micheal Anderson）在他那部精妙的、思辨的、卻有些抽象的《十九世紀蘭開夏的家庭結構》（*Family Struc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Lancashire*, 1971）裏對此進行了很好的概括：即空洞片面的框架。正因為歷史學家目前使用了訪談方法，所以，很有可能產生九十年來最豐富的家庭史，從而確立家庭的主要模式，以及時間、地點、生命週期和兩性之間的變化。整個兒童史也開始成為可行的。此外，假如家庭的支配力量是藉助家務勞動、家庭服務以及在大多數婦女的一生中所具有的母性確立的，那麼婦女史的範圍也幾乎會得到同樣的擴大。

在所有這些歷史領域裏，只要通過自下而上地引入新的證據，轉移歷史重心，開闢新的探索領域，向某些假設和公斷發出挑戰，對曾被忽視的實質性群體加以重新認識，便會產生一種累積式的、運動着的轉變過程。這樣，歷史寫作本身的範圍就會變得廣闊和豐富起來，其社會使命同時也會產生變化。簡言之，歷史變得更加民主了。君王的編年史也關注普通人的生活經歷了。

不過，對這種變遷來說，還有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維度。寫作歷史的程序是隨着其內容的變化而變化的。對口頭只能根據證據的利用，破除了橫亙在編年史學家與其讀者之間以及教育機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障礙。本質而言，這種變化是由既具有創造性特徵，又具有合作性特徵的口述史方法造成的。當然，一旦口頭證據被記錄下來，它就會像所有其他類型的文獻資料那樣能夠為圖書館裏的單個學者所利用。不過，倘若我們滿足於此，就會丟掉口述史方法最主要的優點：即它的彈性，也就是恰巧在需要證據的地方掌握證據的能力。一旦歷史學家着手訪談，他們便會發現自己不可避免地要與他人——至少是他們的信息提供者——共同合作。此外，要想成為成功的訪談員，就必須要掌握一套新的技巧，包括對人際關係的理解。有些人幾乎能夠馬上掌握這些技巧，而其他則需要再學一學；不過，與那些上了年紀的專業史學家窮其畢生的積累過程（即對信息的學習和積累在文獻分析和詮釋過程中的優勢）相比，迅速學會成為很有成效的訪談員還是可能的。因此，歷史學家在某些方面仍舊保持專業知識優勢的同時，還可以成為實地調查員，繼而發現自己離開書桌以後，仍然可以分享人類的經驗。

正是由於上述這些特點，口述史特別適合於課題工作，它不僅可以成為群體，也可以成為單個學生的事業：不管是在學校、大學或學院，還是在成人教育或社區中心。口述史可以隨時隨地落實下去。在國內任何地方，口述史都可以成為地方研究的豐富的主題：如地方工業或手工業史、特定共同體中的社會關係、文化和方言、家庭的變遷、戰爭和罷工的影響，等等。口述史課題肯定是可行的。特別是在課題的重心落在當前人們所關注的歷史根源的情況下，口述史還會很明確地表明歷史研究與當下環境的有關係的。

在學校，孩子們已將與自己的家庭史有關的課題設計出來，它提供了能夠將其自身的環境與內容更加廣泛的過去聯繫起來的有效方法。此外，家庭史還具有其他兩種特殊的教育價值。它可以確立以孩子為中心的觀點，因為它把孩子們有關自己家庭和親戚的知識，對照片、舊書信和文獻、剪報的接觸，以及各種記憶當作成為課題的基礎。同樣，家庭史也可以鼓勵家長參加學校活動。

孩子們自己的家庭史或許體現了最簡單的課題類型。這更適於提出而不是解決歷史問題。年齡大些的群體很有可能選擇某些更帶有集體利益色彩的問題。例如，在牛津大學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哈里森（Brian Harrison）帶領他的一群學生對學院僱員史進行了一項小規模的研究，這群工作人員對其僱主以前的那種畢恭畢敬、忠心耿耿、謹小慎微以及着裝和舉止上的忸怩姿態，對今天的大多數學生來說是困惑難解的。通過課題，學生們對學院僱員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反之亦然——同時也對歷史本身的意義有了更深的理解。正如一位學生所評論的那樣：「我同時發現了重要而且有趣的事情……看到了社會變遷對各種生活細節所產生的真正影響……社會環境平常的變化如何改變了傳統共同體內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各種關係」。¹ 藉助訪談過程中的發現感，當下環境還獲得了活生生的歷史維度：人們可以意識到那些不為人知、卻為自身所能感受得到的過去。對新近來到某個社區或地區的人來說，情況尤其如此。知道住處周圍的某些街道或地區在人們到來之前曾經發生過哪些事情是一回事；通過仍然健在的老人心中所回憶起的過去，體會到在那些特殊的地方所洋溢着的愛、那些特殊的街區居住着的鄰里和房屋、那些特殊的商店所特有的親切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這些細微瑣碎的事實不僅具有激發作用，而且還是些很有價值、可以利用的歷史原料。甚至單個學生在實施暑期課題的過程中也能夠通過訪談有效地擴充歷史知識，而且還可以創造些別人以後可以利用的新資源。對於群體課題來說，機會自然更多了。訪談的次數越多，檔案搜尋工作就會開展得更廣泛，研究主題也會變得更加雄心勃勃。

群體課題有好些自己所特有的性質。它需要在知識方面的合作精神，

而不是教育中常有的競爭氛圍。單獨的閱讀、考試和授課讓位給了合作性的歷史研究。參與調查還會使教師與學生之間建立起更親密的、很少有等級色彩的關係，使他們有更大更多的機會進行非正式的接觸。他們之間的關係將會成為相互依賴的關係。教師可以藉助對現存資料的知識和解釋帶來各種特殊的經驗，但他也必須依靠學生們的支持，因為這些學生正是組織者和實地調查者。通過這種方式，某些學生很有可能會展現出許多意想不到的技能。能夠寫出最佳論文的學生並不一定是優秀的訪談員，教師也如此。更加平等的情境被創造了出來。不過與此同時，正因為這些課題可以解決——至少可以拖延——研究與教學之間的衝突，所以它能夠使教師成為更出色的專家。群體課題既是研究，又是教學，它們難分難解地交織在一起，結果，每個方面都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然而，群體課題與獨立課題的基本價值還是相近的。在因為這種創造性的歷史研究具有起內在價值，所以學生們可以分享其中的興奮和滿足。他們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種難題，同時還會給他們帶來個人經驗。他們能夠系統地提出解釋、闡發理論，然後找出很難進行透徹解釋的各種異常事實。他們發現，被訪者並不會很輕易地符合準備材料上所描繪的社會類型。他們需要證明的是那些讓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實、人物和記錄。他們會遇到各種偏見、矛盾以及詮釋證據等方面的難題。學生們最先要做的就是，從書面歷史的宏偉模式中解脫出來，返回到該歷史的基礎，即很難處理的個人生活。

這兩類課題還會產生很重要的後果：即把教育從其制度的避難所中解救出來，帶回到世界裏去。這樣，雙方都會由此獲益。訪談可以把來自不同社會階級和不同年齡群體中的人召集起來，否則，他們很難相聚在一起，更不用說相互間親密的理解了。好些人之所以對學生懷有普遍的敵意，是因為他們對學生實際上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究竟要做些什麼還很不了解，這些會見會使他們對自己心中普遍存在的擔心和成見進行重新估價。這些課題還將表明，歷史並非與普通人自身的生活毫不相干。相反，師生們會進一步直接意識到他們呈現給廣大公眾的形象。通過走進信息提供者生活，師生們會對其未曾有過的價值觀進行更深的理解，並常常對

比他們更少擁有特權的生活所展現出來的勇氣產生敬佩之情。

不過，更根本的是，訪談還意味着到教育制度與生活世界之間的界限，專家與普通公眾之間的界限。歷史學家開始學習訪談了：他們之所以要拜人為師，是因為人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級，或者所受的教育比較少，或者年紀比較大，他們可能了解更多的事情。重建歷史本身成為了越來越需要廣泛合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非專業人員必須扮演批評的角色。正因為把寫作歷史和呈現歷史的重心地位讓位給了各種各樣的人，歷史才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此外，尤其是老人受益良多。口述史課題不僅能夠給這些老人帶來更多的社會接觸，有時候還會帶來持久不斷的友誼，甚至提供給他們料想不到的服務。儘管他們常常被人忽略，經濟上也軟弱無力，但在追憶自己的生活並把有價值的信息提供給年輕一代的時候，他們仍然會產生尊嚴感和實現感。

只有口述史才有可能實現這些變化，但這些變化也不僅僅限於着書立說和實施課題。它們還會對博物館、檔案館和圖書館所呈現的歷史產生影響。目前，這些機構都有能力將生活融入到收集工作之中，並借此使其自身與社區之間建立一種更加積極的關係。它們可以成立自己的研究課題，如有關伯明翰城市洗澡堂和洗衣房的研究，南安普敦西印度港的社區研究，帝國博物館對早期飛行術的研究計劃，以及對出於良知而拒服兵役的研究計劃等等。近幾年來，英國的許多博物館都是口述史課題的發起者，他們通過人力服務委員會（Manpower Service Commission）為失業青年尋找短期工作，這不禁使人想起美國新政時期的聯邦作家項目（Federal Writers Projects）。伯納德（Tienne Bernard）發起的「生態博物館」計劃（the 'ecomusee' programme）便是一種頗受注目的想法，該計劃提出了無建築博物館的設想，即通過社區來實施錄音課題，借用四鄰五舍的照片和實物——用完了還會還給他們——舉辦臨時性的展覽。有趣的是，曼徹斯特猶太博物館便是曼徹斯特口述史研究項目的產物，該項目是由工藝專科學校的威廉斯（Bill Williams）發起的，它促使城市裏的猶太社區挽救了已經關上大門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猶太教堂。如今，該教堂作為永久性的博物館已經開放了，在那裏，當你凝望着那些捐